

## 從山東寒士到中興名宰： 南宋呂頤浩的早年經歷與性格分析

梁偉基

三聯書店(香港)出版部

### 導言

南宋名相呂頤浩(1071–1139)作於晚年的〈乞依舊宮觀狀〉云：「臣年將七十，坐以待盡，自意此生不復瞻望天日之光矣。又況無謀可詢，無事能策，豈謂睿慈記憐舊物，宸翰屢頒，使人促召？而臣臥病日久，皮骨僅存，氣息奄奄，全不入食，形骸支離，久立則仆，寔已不可支吾。」<sup>1</sup>紹興九年(1139)四月，頤浩卒於台州，享壽六十有九。<sup>2</sup>

按宋高宗(1127–1162在位)在應天府即位後，立時命頤浩奔赴行在議事，不久任命他出知揚州，先後掌管戶、吏這兩個非常關鍵的部門，隨即升任同簽書樞密院事，躋身執政行列。苗劉兵變平定後，頤浩繼朱勝非(1082–1144)為相，執政一年罷職；後來，再取代范宗尹(1100–1136)入相，執政兩年罷職，總計他前後在相位約三年。由於父親早亡，家境窮困，呂頤浩年輕時即已負起供養家中老幼的責任。雖然家庭環境不理想，但他仍然發憤讀書，終於進士及第，踏上了變幻莫測的宦途。正如頤浩自云，他是「自寒苦起家，及宦，赴公盡瘁，不敢辭難，致仕將相」。<sup>3</sup>

本文之作，旨在審視呂頤浩的家世背景、仕途經歷、性格特徵及其面對的各種政治課題，藉此重構頤浩拜相前的生平圖像，以及他上台執政後所面對的局面。

<sup>1</sup> 呂頤浩：《忠穆集》，《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清翰林院鈔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卷五〈乞依舊宮觀狀〉，頁十二下。

<sup>2</sup> 佚名(編)、刁忠民(校點)：《呂忠穆公年譜》，收入《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575、3578。

<sup>3</sup> 張丑(1577–1643)：《清河書畫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五下〈補遺〉，頁十三上。

## 西北二邊風雲變色

徽宗(1101–1125在位)年間，宋夏戰爭再起，宋人收復鄯、湟、洮三州後，全面控制橫山地區。此時的西夏可謂窮途末路，<sup>4</sup>遂再透過遼國向宋廷請和。徽宗君臣認為，他們已制服西夏，下一步便是制服遼國。

### 「制服遼國」的策略

童貫(1054–1126)等代表徽宗出使遼國期間，燕人馬植表示有意歸附北宋，向童貫獻上「取燕之策」。<sup>5</sup>政和三年(1113)，女真族領袖完顏阿骨打(金太祖，1115–1123在位)起兵反遼。兩年後，童貫欲乘勢收復燕京，不少朝臣起而反對，加上宋廷尚未詳悉遼金勢力消長，因而作罷。不久，薊人高藥師逃往登州，指金人已佔領遼國大半土地。<sup>6</sup>徽宗得知東北最新形勢後，認為制服遼國的時機已到，即派遣馬政等人前往金國，試探金人態度。

宣和二年(1120)，馬政以「買馬」為名二次使金，其實是商討夾攻遼國。雙方最終達成合作協議，史稱「海上之盟」，然而「軍興多事，自茲始矣」。<sup>7</sup>

宣和四年(1122)正月，金兵攻陷遼中京，天祚帝(1101–1123在位)出逃，耶律淳(1063–1022)被擁立為帝。四月，童貫受命為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率領十五萬大軍出征燕京。宋軍兵分兩路：种師道(1051–1126)一路進向白溝河，辛興宗一路進向范村，兩支宋軍皆受到遼兵阻擊，童貫惟有撤軍。

六月，耶律淳過世，情報指「燕人無主」，願向宋廷納土。<sup>8</sup>徽宗以為機不可失，命童貫不用班師，改命劉延慶(1068–1127)為都統制，回師進攻燕京。遼知易州高鳳、涿州留守郭藥師，分遣使者往宣撫司約降。劉延慶採用郭藥師所獻計策：由郭藥師率領一千常勝軍，楊可世率領五千西兵，從東面偷襲燕京，乘勢攻入城內，與

<sup>4</sup> 脱脱(1313–1355)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六八〈童貫〉，頁13658–59。有關北宋中葉的拓邊政策，詳參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

<sup>5</sup> 李心傳(1167–1244)：《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北京：中華書局重印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1988年)，卷一，頁2。

<sup>6</sup> 同上注，頁3。

<sup>7</sup> 宗澤(1059–1128)(撰)、樓昉(編)、王庭曾(重印)：《宗忠簡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遺事〉，頁五下。有關宋金海上之盟，詳參徐玉虎：〈宋金海上聯盟的概觀〉，《大陸雜誌》第11卷第12期(1955年12月)，頁24–28；收入宋史研究會(編)：《宋史研究集》第1輯(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頁227–41。新近研究，詳見韓國學者俞垣浚：〈宋金同盟締結要因的一個分析〉，載姜錫東、李華瑞(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9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81–91。

<sup>8</sup> 《要錄》，卷一，頁7。

遼兵爆發巷戰。宋軍入城後，「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加上遼將蕭幹領兵馳援，遼人遂拼死頑抗。此時宋廷援軍遲遲不至，郭藥師等只好突圍。劉延慶在慌亂間，竟乘夜率領中軍逃走。宋軍見主帥逃跑，「遂盡棄輜重、器械奔竄，官軍相蹂踐於路」。於是一夜間，十多萬宋軍潰散無餘。<sup>9</sup>

燕山之役無功而返，宋廷惟有求助金人。金人攻佔燕京後，指責宋廷沒有出兵夾攻遼軍，拒絕交還燕京。幾經談判，金人才願意交還燕京及涿、易、檀、順、薊、景六州，但宋廷每年要付金國一百萬貫的「燕京代稅錢」。至於平、營二州，金人則拒絕交還。宋廷無奈接受金人提出的條件，將燕京改為燕山府路。<sup>10</sup>

為保留常勝軍，宋廷竟以燕京百姓充數歸還金國，結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捲而東，朝廷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sup>11</sup>常勝軍約有三萬餘人，「月費縣官糧猶十餘萬斛」，加上稱為「食糧軍」的一萬餘契丹兵，令「費用錢糧不可勝計」，<sup>12</sup>成為宋廷沉重的財政負擔。然而，「燕中自罹兵火，田地荒曠」，<sup>13</sup>宋廷為滿足燕山府的財政需求，命「河北、河東、京東、京西之民，轉菽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絡繹於道」；<sup>14</sup>又開徵免夫錢，僅江西就徵收了賦錢一百五十七萬，且「漕運之費不預焉」，總計免夫錢所得共六千二百餘萬緡。<sup>15</sup>結果，「齊、趙、晉、代之間，民力皆竭，而群盜蠡起」。<sup>16</sup>史載「燕山初定，盜賊不可勝數，剽劫行李，商旅遂絕」，負責押運物資的宋廷部押官亦「往往在雄州，不敢北去」。<sup>17</sup>

<sup>9</sup> 周應合(1213–1280)：《景定建康志》(以下簡稱《建康志》；臺北：大化書局影印清嘉慶七年〔1802〕仿宋本重刊本，1980年)，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五八上；李綱(1083–1140) (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卷六二〈乞置賞功司筭子〉，頁664。

<sup>10</sup> 有關燕山之役，詳參李天鳴：〈宋金聯合攻遼燕京之役——燕山之役〉，載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秘書處(編)：《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史學系，1996年)，頁283–305。

<sup>11</sup> 黃以周(1828–1899)等(輯注)、顧吉辰(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四六，頁1433。

<sup>12</sup> 徐夢莘(1126–1207)：《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四年〔1878〕歲次戊寅越東集印本，1967年)，卷一九四，頁二下至三上。

<sup>13</sup> 馬擴：《茅齋自敘》，引自李樹田(主編)、傅朗雲(編注)：《金史輯佚》(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131。

<sup>14</sup> 范仲熊：《北記》，引自《金史輯佚》，頁161。

<sup>15</sup> 《會編》，卷三一，頁九下；曾敏行(1118–1175) (著)、朱杰人(標校)：《獨醒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五，頁45。有論者統計出，免夫錢徵收的數量，略相當於北宋常年總歲入數的十分之六七。見汪聖鐸：《兩宋財政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14。

<sup>16</sup> 《要錄》，卷一，頁9。

<sup>17</sup> 《北記》，頁161。

靖康(1126–1127)、建炎(1127–1130)年間，兩河盜寇橫行，「少者數百，多者數千」，<sup>18</sup>其禍實肇於此。宋代名臣許景衡(1072–1128)遂有「燕山之役，成中原之禍」的評論。<sup>19</sup>

### 宋金走向戰爭

宣和五年(1123)六月，宋廷接納金南京留守張覺(?–1123)歸降，導致金人進襲平州，張覺逃至燕山府。雖然宋廷移送張覺首級予金人，但金人仍以此為藉口，加上向宣撫司索糧不遂，遂出兵攻宋。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祖完顏阿骨打(1115–1123在位)第二子宗望(斡離不，?–1127)率兵進攻燕山府，金國開國功臣宗翰(粘罕，1078–1130)領兵攻打太原。宗望連下檀、薊二州後，郭藥師降金，燕山府主要官員包括呂頤浩等皆為金人俘虜。十二月，宗翰連破朔、忻二州，圍攻太原，但太原軍民頑強抵抗，阻延了宗翰南下與宗望會師。

宗望大軍壓境，徽宗急謀對策，一方面派李鄴使金，以緩和和金人攻勢，另一方面接納吳敏所獻之計，禪位給兒子趙桓(欽宗，1126–1127在位)。欽宗即位後，黃河兩岸的宋軍潰敗，形勢急轉直下，徽宗乘船逃往江南，童貫拒任東京留守，與高俅(?–1126)扈從徽宗出逃。欽宗先以李綱為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措置開封防務，再派大臣與金人議和。宋金雙方商議後，康王趙構(高宗)以軍前議和使的身份，帶領使團「乘一棧渡濠，自午，及夜分，始達敵寨」，與金人談判。<sup>20</sup>最後，宗望引兵北返，第一次開封防衛戰結束。

金人退兵後，宋廷在是否割讓三鎮(中山、真定、太原)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宋臣之中，秦檜(1090–1155)等三十六人反對割讓三鎮，范宗尹等七十人主張割讓，結果引來金人第二次南侵。然而，這場爭論已沒有意義，因為金人目的是要盡得兩河之地，「割亦來，不割亦來」。<sup>21</sup>

靖康元年(1126)秋天，宗望再度南下，宗翰繼續圍攻太原。欽宗命种師道為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撫使，負責開封防務，又派姚古率軍支援太原，种師中(1059–1126)領兵支援中山、河間，但姚古兵敗盤陀，种師中戰死榆次。<sup>22</sup>欽宗改以李綱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率兵救援太原，但三路援軍皆敗，遂再起用种師道為河

<sup>18</sup> 《會編》，卷八七，頁八上至八下。

<sup>19</sup> 許景衡：《橫塘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論王安中自便筓子〉，頁六上。

<sup>20</sup> 《要錄》，卷一，頁13。

<sup>21</sup> 《宋史》，卷三五三〈何臬傳〉，頁11136。

<sup>22</sup> 有關种師中，詳參何冠環：〈論靖康之難中的种師道(1051–1126)與种師中(1059–1126)〉，載何冠環：《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頁551–84。

北、河東宣撫使。不久，金人攻下太原。欽宗用人施政毫無章法，於此可見一斑，無怪乎當時太學生譏諷宋廷，「不救肅王廢舒王〔王安石〕，不禦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sup>23</sup> 為了振奮城內軍民士氣，欽宗下令賜死蔡攸（蔡京長子，1077–1126）、朱勔（1075–1126），童貫梟首示眾，蔡京（1047–1126）流放海南，可惜為時已晚，無可補救，因為金人已經兵臨城下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宗望抵達開封城下，屯兵劉家寺；三十日，宗翰亦抵達開封城下，屯兵青城。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乘大雪攻城愈急」。<sup>24</sup> 午時，金兵攻破陳州門，登上城樓，開封淪陷。金兵佔領開封後，決定廢立異姓，<sup>25</sup> 於靖康二年（1127）三月七日，冊立張邦昌（1081–1127）為楚帝，結束北宋一百多年的統治。

金兵抵達開封前，趙構再度奉命出使河北，向金人請和。欽宗心知和議無望後，命秦仔等分持親筆蠟書前往相州，授予趙構河北兵馬大元帥，盡起河北一路軍馬進京勤王。<sup>26</sup> 秦仔抵達相州後，韓公裔「破蠟彈，得黃絹方四吋許，親筆細字：『知卿起義勤王，可除卿兵馬大元帥，陳遘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sup>27</sup> 又准許他「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便宜草詔書，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sup>28</sup> 趙構領命後，從相州渡河前往大名府，「初京城圍久，號令不通，王軍在相州，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天下申陳四集，取決霸府矣」。<sup>29</sup> 可見河北兵馬大元帥府（以下簡稱「元帥府」）隱然成為當時的權力中樞。

李邴（1085–1146）〈再申大元帥府狀〉云：「方今天下大變，君父劫質，儲闈近屬，舉族皆行，惟大王一人提兵在外。」元帥府成為趙宋「宗廟社稷血食所繫，四海郡國號令所稟，億兆士庶存亡所賴」，<sup>30</sup> 是當時凝聚北宋軍民、令宋廷統治得以延續的政治象徵，也是兩宋過渡的軍政機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高宗初年的政治發展。

<sup>23</sup>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中，頁43。

<sup>24</sup> 陳東（1086–1127）（撰）、鄭明寶（整理）：《靖炎兩朝見聞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上卷，頁151、152、154、155。

<sup>25</sup> 有關開封城破後，金人廢立異姓始末，詳參梁偉基：〈從「帝姬和親」到「廢立異姓」——北宋靖康之難新探〉，《新史學》第15卷第3期（2006年9月），頁1–46。

<sup>26</sup> 有關兩宋之際的元帥府，詳參陳瑞青：〈宋代河北兵馬大元帥府探微〉，《滄桑》2010年第4期，頁106–7、129；梁偉基：〈宋代河北兵馬大元帥府初探：以武力重建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5期（2012年7月），頁59–81。

<sup>27</sup> 《會編》，卷七十，頁十二下。

<sup>28</sup> 熊克（1111–1189）（撰），顧吉辰、郭群一（點校）：《中興小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卷一，頁3。

<sup>29</sup> 《要錄》，卷一，頁23。

<sup>30</sup>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卷三八二二〈李邴二·再申大元帥府狀〉，頁51–52。

## 擁立集團

根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高宗曾回憶即位前的艱苦經歷：「向自相州渡大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sup>31</sup> 這段記載說明高宗沒有忘記他與這群從龍之臣同甘共苦的經歷。

元帥府成立後，趙構委任了一批幕僚，包括副元帥、參議官、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王府記室、隨軍應副、隨軍輦運、隨軍轉運使等。這批幕僚有學者稱為「擁立高宗集團」，<sup>32</sup> 其中耿南仲(?-1129)、黃潛善(?-1128)、汪伯彥(1069-1141)皆上表趙構，請他繼承皇位。高宗繼位後，這些幕僚不少成為高宗初年政治中樞的重要人物，左右著當時的政局發展。例如黃潛善、汪伯彥先後拜相，卻因為措置不當，導致揚州潰敗；藍珪、康履是趙構寵信的內侍，卻成為苗劉兵變的導火線。

呂頤浩兩次執政，都起用了擁立集團的成員，例如梁揚祖、滕康(1085-1132)、周望、李迨，或入主權力中樞，或擔任地方大員。滕康先後為試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周望先後為試給事中，江浙制置使，試兵部尚書，同簽書樞密院事，兩浙、荊湖等路安撫使，同知樞密院事兼兩浙宣撫使。李迨先後為御營使司參議官，試戶部侍郎，淮南、江浙、荊湖等路制置發運使。由此可見，頤浩的手下不少是擁立集團中人。

## 圍城中人

金兵撤出開封後，呂好問(1064-1131)向張邦昌進言：「今日康王在外，普天之下同心共戴，為公計者，曷以大物歸之乎？」<sup>33</sup> 接著再提出：「盍舉欽聖故事乎？」張邦昌以為「敵去未遠，請俟踰境」，呂好問卻認為：「何可緩也？」張邦昌遂召集百官於文德殿，親降手書請元祐太后(1073-1131)御延福宮。<sup>34</sup>

為甚麼說「何可緩也」？呂好問解釋道：「宜早遣使推戴康王，城內便是功臣；若先為城外推戴策立，城內便是叛臣。為功臣，為叛臣，只在此舉，豈可少緩耶！」否則，「豈相公不能自保，吾輩家屬豈可保耶？」<sup>35</sup> 呂好問的一番分析，足以說明經歷巨變的圍城士大夫所處環境極其嚴峻。張邦昌遂派謝克家(?-1134)攜同傳國玉璽前往濟州，迎請趙構返回開封。<sup>36</sup>

<sup>31</sup> 《要錄》，卷十八，頁360。

<sup>32</sup> 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頁66。

<sup>33</sup> 王稱：《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二二〈張邦昌〉，頁四上。

<sup>34</sup> 《要錄》，卷四，頁94。

<sup>35</sup> 《會編》，卷九二，頁六下。

<sup>36</sup> 《要錄》，卷四，頁95。據云張邦昌「反正之功，蓋出于呂舜徒」，然而「啟其端者，堂吏張〔下轉頁107〕

另一方面，趙構對於圍城士大夫的取態甚為關注，因為當時「京城圍閉，朝廷命令久不通」，恐怕「姦宄乘時妄作」，故率先「布檄四方，以定人心」。<sup>37</sup>他又力主寬宥從偽的士大夫，呂好問、張所(?-1127)在書信中提及「圍城士大夫趨向」者，他「悉焚而勿問」。<sup>38</sup>除予以寬宥外，趙構更要刻意籠絡，凡「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張邦昌及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一切不問」，因為他「不欲令赦恩薄於偽赦故也」，<sup>39</sup>以爭取圍城士大夫效忠南宋。

趙構即位後，「初命滕康草赦文，或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他以為不妥，「命耿延禧改定以進」，且交待耿延禧「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sup>40</sup>可見趙構奉行「靖康舊臣，悉貸弗誅」的政治方針，<sup>41</sup>一心要保全圍城士大夫，借用他們的政治力量協助南宋統治。南宋建立後，「李回復入樞府、謝克家再為尚書，相繼入參大政。范宗尹召為中丞，未踰年拜相」。<sup>42</sup>這說明高宗深明包容政治的重要性。<sup>43</sup>

對於張邦昌，趙構同樣是從寬處理。他問黃潛善該如何處置張邦昌？黃潛善等認為：「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趙構「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則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授予張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sup>44</sup>可見高宗利用張邦昌作為自己的護身符。

圍城士大夫是高宗初年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足以左右當時的政治發展，例如宰相李綱認為，「士大夫屈補於偽庭者，不可勝數」，<sup>45</sup>主張嚴懲從偽的士大夫，令李綱與黃潛善、汪伯彥的權力鬥爭越趨激烈；宰相范宗尹提出討論濫賞問題，因為觸及圍城士大夫的自身利益，結果成為范宗尹下台的導火線。

呂頤浩兩次執政，同樣起用了圍城士大夫，或為中央大員，或為地方大員，例如謝克家為兵部尚書，范宗尹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葉份為江淮等路發

〔上接頁106〕

思聰也」。張思聰「字謀道，知書能文，嘗從先人學」，南宋建立後，思聰已亡，「詔特贈宣教郎」，「今其子孫尚有事刀筆于省中者」。見王明清(1127-1214後)：《揮塵錄》(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後錄卷四，頁130。

<sup>37</sup> 《會編》，卷八九，頁十一下。

<sup>38</sup> 同上注，卷九十，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sup>39</sup> 《要錄》，卷四，頁113。

<sup>40</sup> 《會編》，卷一百二，頁一上。

<sup>41</sup> 孫覿(1081-1169)：《鴻慶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乞出第一狀〉，頁七上。

<sup>42</sup> 趙鼎(1085-1147)(撰)，來可泓、劉強(整理)：《辯誣筆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卷一，頁89。

<sup>43</sup> 劉子健：〈包容政治的特點〉，載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41-77。

<sup>44</sup> 《要錄》，卷五，頁118。

<sup>45</sup> 同上注，卷六，頁144。

運副使、戶部侍郎兼提舉車駕巡幸事務、兼權禮部侍郎提領措置(度牒)、試戶部尚書，黃唐傳為給事中、殿中侍御史。由此可見，呂頤浩的下屬不少是圍城士大夫。

### 康王繼承大統

在擁立集團和圍城士大夫的支持下，趙構在應天府繼位。最初議定年號時，黃潛善定為「炎興」，耿南仲以為「此蜀年號也」，「眾皆服」，認為「宜仿藝祖」，遂改元「建炎」，寓火克金之意。<sup>46</sup>有士大夫附會說：「女真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即銷，終不能為國家患。」<sup>47</sup>

金人根據「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的方針，<sup>48</sup>兵分三路南侵：東路攻下青、濰二州，中路攻下唐、鄧二州，西路攻下同州、華州、鳳翔，於是在何地駐蹕就成為高宗君臣急需解決的問題：黃潛善、汪伯彥主張遷往揚州，李綱主張遷往南陽，宗澤主張返回開封，劉觀、衛膚敏、許景衡主張遷往建康。高宗最後決定巡幸東南，駐蹕揚州。<sup>49</sup>金人知悉高宗南遷揚州，遂由宗翰、宗輔、婁室分別從東路、中路、西路南下，力求撲滅高宗的新生政權。

建炎三年(1129)春正月，宗翰攻下徐州，不久抵達泗州，渡淮南下。據趙鼎事後記載，宋廷早在一個月前已收到金人南侵的消息。二月初，前線傳來急報，但「朝廷不以為然」。<sup>50</sup>當金兵逼近的消息傳出後，揚州百姓「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有官員問黃潛善、汪伯彥有何應對辦法，兩人皆說：「已有措置，不必慮。」<sup>51</sup>

金兵數百騎掩至天長軍，江淮制置使劉光世(1089–1142)率所部迎敵，未幾潰敗，這時金兵前鋒距揚州只有一百多里路程，高宗派內侍鄺詢往天長軍伺察，得悉天長軍失守後，立即「介冑走馬出門」，隨行的只有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康履數人，百姓見之，皆云：「大家去也。」城內頓時一片混亂，高宗與百姓「並轡而馳」。這時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食中堂」，堂吏告訴他們說：「駕行矣。」兩人立刻換上戎服，「鞭馬南驚」。<sup>52</sup>呂頤浩與張浚(1097–1164)聯騎在瓜州渡趕上高宗，然後一同乘小舟渡江。金人得知高宗已逃離揚州，立即派兵前往瓜州渡追截，但沒有成功。

<sup>46</sup> 同上注，卷五，頁115。

<sup>47</sup> 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十二〈虜改沃州〉，頁516。另一說「以為炎字乃兩火，故多盜」。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甲集卷三〈年號〉，頁92。

<sup>48</sup>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七四〈宗翰傳〉，頁1698。

<sup>49</sup> 《要錄》，卷九，頁214。

<sup>50</sup> 同上注，卷十九，頁387；趙鼎(撰)，來可泓、劉強(整理)：《建炎筆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卷上，頁101。

<sup>51</sup> 《要錄》，卷二十，頁389。

<sup>52</sup> 《中興小紀》，卷五，頁56。



金兵截擊高宗不果後折返揚州，「屯于摘星樓下，城中士女及金帛，為金所取殆盡」。<sup>53</sup>據載，後來「鎮江魚戶於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而「揚子江中遺棄物尤多」。<sup>54</sup>宋廷以至揚州軍民渡江之倉促，於此可見一斑。至二月二十日，金人才撤出揚州。史稱「維揚之役，遭殺戮者不可以萬計」。<sup>55</sup>

高宗渡江後，召集宰執、侍從、諸將議事。王淵認為「暫駐鎮江，止悍得一處，若金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建議遷往杭州，高宗許之。為防金兵渡江，高宗命呂頤浩為江浙制置使，劉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率兩路軍馬屯鎮江；楊惟忠為節制江南東路軍馬，率兵屯建康。後來，頤浩晉升為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防守京口，劉光世、楊惟忠皆受其節制。<sup>56</sup>

當時高宗麾下要將皆駐防在外：張俊（1086–1154）駐防吳江，楊惟忠駐防建康，劉光世駐防鎮江，韓世忠在海道未還，只有苗傅（？–1129）一軍扈從高宗前往杭州。王淵得君心，苗傅一直為之不滿；劉正彥招降劇盜丁進，立下大功，賞賜卻太薄，兩人皆心存怨望。三月五日，苗、劉伏兵杭州城北橋下，待王淵退朝，加以襲殺，再分兵捕殺宦官，「凡無鬚者皆殺」，並「擁兵至行宮北門外」。高宗質問兩人為何發動兵變？他們反指責高宗「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並認為「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來歸，不知何以處？」他們要求高宗禪位皇太子，請元祐太后聽政，遣使金人議和。<sup>57</sup>高宗無可奈何，只有退位。

呂頤浩、張浚得知行在兵變，遂傳檄中外，興師勤王，「祁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sup>58</sup>並由宰相朱勝非在杭州安撫苗、劉二人，避免他們加害高宗。隨著勤王軍逼近杭州，苗、劉最終同意讓高宗復位。其後苗、劉在建康伏誅，這場兵變才算了結。<sup>59</sup>

若論對宋廷的實際破壞，揚州潰退比靖康之難有過之而無不及。高宗即位之初，「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sup>60</sup>但揚州潰退導致大片國土淪入金人手中。若論平定苗劉兵變的功勞，呂頤浩、張浚所立當為首功。因為朱勝非要為這場兵變負責下台，由頤浩取而代之，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營使。頤浩遂在南宋政權登上最高位置。

<sup>53</sup> 畢沅（1730–1797）：《續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卷一百三，頁2711。

<sup>54</sup> 《清波雜誌校注》，卷七〈汴河遺物〉，頁285。

<sup>55</sup> 《會編》，卷一百三十，頁六下。

<sup>56</sup> 《要錄》，卷二十，頁393、399。

<sup>57</sup> 同上注，卷二一，頁417–18。

<sup>58</sup> 同上注，頁451。

<sup>59</sup> 有關苗劉兵變，詳參徐秉愉：〈由苗劉之變看南宋初期的君權〉，《食貨月刊》復刊第16卷第11、12期（1992年3月），頁26–39；虞雲國：〈苗劉之變的再評價〉，載何忠禮（主編）：《南宋史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11–22。

<sup>60</sup> 《要錄》，卷六，頁151。

然而，經歷揚州潰退、苗劉兵變後，南宋面對的形勢比之前更為嚴峻，可謂百廢待興，包括：(一)政權正統性的確立、政府運作的納入軌道、官僚隊伍的重建、政令有效地推行等政治課題；(二)物資的籌措、經濟的恢復、財政管理體制的重建等經濟課題，就成為呂頤浩上台後急需解決的問題。尤其是頤浩第一次上台執政不久，金人便再次南侵，頤浩的政治能力備受考驗。

### 家世及一舉及第

呂頤浩先祖本居樂陵(今山東樂陵西南)，至五世祖因官徙居齊州(治今山東濟南)。<sup>61</sup>就地域而言，他經常強調自己「本東北人」、「世為北人」、「生長東北」、「生長西北兩邊」，可見他是北人；就家世而言，他形容自己是「世貫寒鄉」、「奮由寒素」、「奮跡寒鄉」，<sup>62</sup>可見他並非出身名門望族。以下，筆者嘗試闡述頤浩的家世背景，以及他如何在科場上一舉及第。

#### 父以子貴的山東寒族

《嘉靖壽州志》云：「呂頤浩，夷簡之曾孫。」<sup>63</sup>然而《宋史·呂夷簡傳》云，呂夷簡(978–1040)，「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為壽州人」；<sup>64</sup>《宋史·呂頤浩傳》云「其先樂陵人，徙齊州」。<sup>65</sup>可見呂頤浩與河南呂氏並無關聯，或許是記載錯誤，又或許是編者故意把兩者混淆起來。<sup>66</sup>

<sup>61</sup> 《宋史》，卷三六二〈呂頤浩傳〉，頁11319。有關呂頤浩的籍貫，文獻有兩個說法：一是滄州樂陵，一是齊州。劉雲軍綜合各家說法，認為頤浩的祖上原居樂陵，後徙居齊州。見劉雲軍：《呂頤浩年譜》(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

<sup>62</sup> 《忠穆集》，卷二〈上邊事善後十策〉，頁一下；〈論分道進兵之策〉，頁六下；卷三〈辭免知池州乞宮觀劄〉，頁七上；卷四〈任左僕射乞宮觀表〉，頁九上；〈謝封成國公加食邑表〉，頁十九上；〈謝除男抗撫職名并侄挺改官表〉，頁十下；〈謝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荊湖軍事表〉，頁十一下；卷五〈論乞於邕州置買馬司狀〉，頁十一上。

<sup>63</sup> 栗永祿(編次)：《嘉靖壽州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1981年)，卷七〈人物紀·呂頤浩〉，頁三十下。

<sup>64</sup> 《宋史》，卷三一—一〈呂夷簡傳〉，頁10206。日本學者衣川強在他的《宋代官僚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頁85中編製了河南呂氏的譜系，其中並沒有出現呂頤浩的名字，足見兩者沒有血緣關係。

<sup>65</sup> 《宋史》，卷三六二〈呂頤浩傳〉，頁11319。

<sup>66</sup> 斯舜威在諸暨呂氏聚居地橫山發現了《呂氏乘寶》、《諸暨開化呂氏宗譜》及《諸暨西山呂氏族譜》，並據此寫成《宰相世家——兩宋呂氏政治集團紀略》(上海：東方出版社，2011年)。此書第八章專門介紹呂頤浩，指頤浩祖先可追溯到唐朝名臣呂渭(734–800)，渭生有五子：溫、良、恭、儉、讓，呂蒙正(946–1011)、呂夷簡、呂公著(1018–1089)出自呂溫一脈，呂洞賓、呂頤浩出自呂讓一脈，則夷簡與頤浩有同一祖先(頁119)。呂渭為頤浩先祖，及夷簡與頤浩同出一源之說，這裏聊備一說。

程俱(1078–1144)《北山集》收錄了數篇呂頤浩父祖的贈官制文，為了解其祖上三代的背景提供了一些資料：(一)曾祖父呂元吉，曾祖母李氏；(二)祖父呂京，祖母耿氏；(三)父親呂當，母親魏氏。<sup>67</sup>

呂元吉、呂京的贈官制文沒有提及他們贈官前的階官，可以推斷他們沒有出仕為官。呂當在「熙寧之初，始以經術造士，其在科甲，率多俊良。然有策名，雖振于一時，而歷位不過于八品。……效能官次，綽有廉平之稱」。從「科甲」、「策名」、「官次」的描述來看，呂當肯定是科舉出身，然後出仕為官，並贏得「廉平」的美譽。雖然呂當為官清廉公正，然而官位不高，「不過于八品」。<sup>68</sup>從制文標題看來，他最後的階官應該是宣德郎。<sup>69</sup>據呂頤浩自述，其父於元豐(1078–1085)年間曾任祁州司理。<sup>70</sup>河北大儒李洪曾題詩祁州清風樓，呂當以詩和之，後來中山帥韓絳(1021–1088)「見詩喜之」，遂上書薦舉呂當，<sup>71</sup>這可以證明呂當能寫一手好詩。<sup>72</sup>

由此所述，呂頤浩祖上三代並不顯貴，不過是他兩度拜相，出將入相，其祖上三代才得到贈官，<sup>73</sup>是名副其實的父以子貴。

### 儒學進身的山東寒士

儘管呂頤浩不是出身大族，但從其「家傳末學」、「承先人詩賦之學」的記述看來，<sup>74</sup>其家族應有相當的文化修養，他亦承襲家學。元豐末年，范純仁(1027–1101)出知濟南府期間，頤浩入讀濟南府學，<sup>75</sup>可見他曾接受地方官學教育。在家學與官學的相互作用下，他「以儒學進身」，<sup>76</sup>憑藉自己的努力，登紹聖元年(1094)畢漸榜進士。

呂頤浩早年曾賦詩表達對登科的感受：「元符〔己〕卯年二月初二日，夜覽於燈

<sup>67</sup> 程俱：《北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五〈右僕射呂頤浩曾祖贈太子少保元吉贈太子太傅〉、〈曾祖母蔡國夫人李氏贈兗國夫人〉、〈祖贈太子少傅京贈太子太傅〉、〈故祖母崇國夫人耿氏贈徐國夫人〉、〈故父任宣德郎贈太子少師當贈太子太師〉、〈故母溫國夫人魏氏贈鄆國夫人〉、〈故妻嘉國夫人衛氏贈蔡國夫人〉、〈故妻和國夫人姜氏贈衛國夫人〉，頁一上至五上。

<sup>68</sup> 同上注，〈故父任宣德郎贈太子少師當贈太子太師〉，頁三下。

<sup>69</sup> 另見劉雲軍：《呂頤浩年譜》，頁3–6。

<sup>70</sup> 《忠穆集》，卷八《燕魏雜記》，頁十下至十一上。呂當任官祁州期間，有詩云：「祁陽要郡冠邊州，池壘深高北控幽。欹岸綠楊浮水面，銜山紅日照簷頭。立功慷慨思投筆，鬻已卑污恥飯牛。獨使燕然銘漢德，百年忠憤遣人愁。」

<sup>71</sup> 《忠穆集》，卷八《燕魏雜記》，頁十一上。

<sup>72</sup> 斯舜威《宰相世家》頁183據《諸暨西山呂氏宗譜》記載，謂呂當獲韓絳薦為左宣德郎，可備一說。

<sup>73</sup> 《北山集》，卷二五〈故父任宣德郎贈太子少師當贈太子太師〉，頁三下。

<sup>74</sup> 《忠穆集》，卷六〈與劉仲忱書〉，頁十上。

<sup>75</sup> 同上注，卷七〈跋范堯夫范彝叟范德孺墨蹟〉，頁二下。

<sup>76</sup> 同上注，卷一〈上邊事備禦十策〉，頁一下。

下，自恨昔時文字不工，雖得一等，然碌碌行間，深可恥也。要須激昂壯志，脩宦業以紹復先人之意。」<sup>77</sup>反映出他對仕途並不滿意，但還是抱有希望，期盼宦業過人，可以光耀門楣。

雖然呂頤浩的五世祖曾經為官，但這種仕宦經歷沒有延續下去，至少在歷史上其曾祖父和祖父都沒有出仕為官的記載，直至其父才擔任下級官員。由此可以判斷，頤浩出身自一個尋常的普通官員家庭。據《呂忠穆公年譜》所云，「紹聖三年丙子，公鄉居。家貧，自此凡數年不調官」。自其父親過世後，因為家境貧困，頤浩須「躬耕以贍老幼」，<sup>78</sup>可見其家境並不富裕。

### 出仕及早年仕宦

紹聖元年，「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sup>79</sup> 呂頤浩正好在這一年進士及第，踏上了漫長的仕宦生涯。哲宗親政後，「執政官及近臣相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為宰相，嫉元祐用事，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sup>80</sup> 頤浩一踏進官場，便要面對新的政治形勢。

呂頤浩經歷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五帝，「歷官四朝」。徽宗時代他「事道君皇帝踰二十年」，那是他累積政治經驗、培養自己成為技術官僚的階段；<sup>81</sup> 高宗時代他「兩叨鼎軸」，則是他在政壇大展拳腳的階段。<sup>82</sup> 事實上，頤浩開創了不少南宋甚至兩宋政治之先例：

<sup>77</sup> 同上注，卷七〈跋奪標錄〉，頁五下。

<sup>78</sup> 《宋史》，卷三六二〈呂頤浩傳〉，頁11319。

<sup>79</sup> 同上注，卷三二八〈李清臣傳〉，頁10563。

<sup>80</sup> 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集卷四九〈李黃門清臣行狀〉，頁八上。

<sup>81</sup> 《忠穆集》，卷七〈跋宣和御畫〉，頁三下。技術官僚乃西方政治社會學術語，是指一批擁有專業技能的官僚，例如財政、行政、法律等專門知識。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有所謂 Technocratic School 的政治學派，他們極為重視技術官僚，認為美國的官僚系統將會被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士所壟斷。他們與米爾斯 (C. Wright Mills) 等權力精英論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強調技術官僚精英，劃入精英分子的層面比米爾斯更精細。本文談及的技術官僚，乃專指具備豐富的財政知識與經驗的官僚。另一方面，宋代也有一批稱為技術官的官僚。根據文獻記錄，「技術」與「伎術」、「藝術」意思相同，乃指各種知識、技能或學問。這些技術官分別具有天文、音樂、醫術、繪畫、膳食等各方面的技能。然而，他們的地位要比文武官階為低。詳參余貴林、張邦偉：〈宋代技術官研究（上）〉，《大陸雜誌》第83卷第1期（1991年7月），頁1。有關宋代技術官僚的狀況，詳參 Robert M. Hartwell, "Financial Expertise, Examination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 no. 2 (February 1971), pp. 281–314; 板橋真一：〈北宋前期の資格論と財政官僚〉，《東洋史研究》第50卷第2號（1991年9月），頁83–105; 熊本崇：〈薛向略伝—北宋財務官僚の軌跡〉，《集刊東洋學》第51號（1984年5月），頁68–89。

<sup>82</sup> 《忠穆集》，卷四〈任左僕射乞宮觀表〉，頁九上。

- 一、中興宰相封國者：呂忠穆，秦申王，張忠獻。
- 二、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 三、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逵及頤浩。
- 四、若前宰相為宣撫者，則自渡江以來，亦止除李伯紀、呂元直、朱藏一三人。
- 五、高宗宰相十五人，惟秦會之為太師，呂元直為少保，其它未有至公相者，而封國亦止二人。
- 六、渡江後，諸大將官既高，皆為宣撫使，使名益輕，于是宰相統兵則稱都督，自呂元直始也。
- 七、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鎮，列聖遵守故事具存。在神宗時，兩朝定策如韓琦，在哲宗時四朝大老如文彥博，皆不敢受，顧臣何者？
- 八、官制行，置左右丞。二府中班最下，無有爰立者。元祐中，蘇子容丞相自左轄登庸，時以為異恩。崇寧初，徽宗亟欲相蔡元長，遂用此故事。時有獻詩者曰：「磊落儀形真漢相，闊疎恩禮舊蘇公。」紹興初，呂元直自簽書樞密院入相，前此所無也。<sup>83</sup>

總之，呂頤浩深得高宗器重，榮寵集於一身，晚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建堂名「退老」，賦詩以百數。<sup>84</sup>他身故後獲贈太傅，再追封太師、成國公，諡「忠穆」。<sup>85</sup>孝宗(1163–1189在位)淳熙十五年(1188)，頤浩蒙恩配享高宗廟庭。<sup>86</sup>

至於呂頤浩自己，他以三個階段來總結自己一生：

某幼年聞真定贖老云：「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廈千間，夜眠八尺。」推此語，則所向足矣！某壯歲在西北塞上，親總軍旅，出入行陣十五年。所至除

<sup>83</sup> 以上引文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九〈中興宰相封國數〉，頁173；《要錄》，卷五五，頁965；卷二一，頁413；《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一〈宣撫使〉，頁215；甲集卷九〈宰相位公孤封國〉，頁172；乙集卷十四〈紹興至開禧督府廢置本末〉，頁743；《忠穆集》，卷三〈辭免少傅兩鎮笏子·第二笏子〉，頁二三上；《揮塵錄》，前錄卷三，頁24。

<sup>84</sup> 《雞肋編》，卷下，頁100。

<sup>85</sup> 高宗初年十位戰時宰相封國公者，除呂頤浩外，只有張浚和秦檜兩人。見《揮塵錄》，後錄卷三，頁108。

<sup>86</sup> 《清波雜志校注》，卷一〈配享〉，頁21。洪邁(1123–1202)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配享人選，但秘書少監楊萬里(1127–1206)力爭以張浚取代頤浩。最後，孝宗一錘定音，以頤浩配享。關於呂頤浩配享高宗祠廟的爭議，詳參羅大經(1196–1242)(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乙編卷一〈高宗配享〉，頁119；《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四〈高廟配饗議〉，頁565–67。李心傳認為洪邁兄弟「皆湯思退舊客，夙有憾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勳，歸之呂元直也」(頁567)。有關呂頤浩配享高宗祠廟，參凌郁之：〈南宋高廟配享之爭考實〉，《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頁61–64；沈如泉：《傳統與個人才能：南宋鄱陽洪氏家學與文學》(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頁293–99。

殘除害，未嘗妄戮一人。佛書有因果報應之理，每以自警也。晚遇上聖，出入將相五六年，備歷艱危。中間屢乞閑退，而所請不獲。再叨柄用二年，分遣諸將平蕩江湖、福建群盜，使民安業。<sup>87</sup>

他將自己一生分為「幼」、「壯」、「晚」三個階段，至晚年才「奮由寒素，晚遇聖神」，<sup>88</sup>可以說是大器晚成。以下，筆者將頤浩拜相前的為官經歷，劃分為三個階段詳加討論。

### 宦途不濟，一事未成

紹聖元年四月，新進士釋謁受官，呂頤浩獲任大名府成安縣尉，掌理縣內治安工作。但是，他登第不久即丁父憂而「居鄉」，「自此凡數年不調官」。<sup>89</sup>此後，頤浩雖再獲授官，但他對自己在這個時期的仕途顯然是有所感慨的，這從〈感舊書懷〉的「宦途忽忽六周星，萬事於今一未成」，<sup>90</sup>便可略知一二。為了方便表述，筆者根據史料編製成表一，<sup>91</sup>以見頤浩出仕之初所任官職及供職之地。

表一：呂頤浩任官表（1071–1112）

年份	階官 / 差遣	供職地	年歲
紹聖元年 (1071)	大名府成安縣尉	北宋屬河北東路 (今河北邯鄲成安縣)	24
元符三年 (1100)	密州司戶參軍	北宋屬京東東路 (今山東諸城)	30
崇寧二年 (1103)	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北宋屬河北東路 (今河北邯鄲大名縣)	33
崇寧三年 (1104)	邠州教授	北宋屬陝西路 (今陝西彬縣)	34
大觀元年 (1107)	邠州教授 (再任)	北宋屬陝西路 (今陝西彬縣)	37
大觀四年 (1110)	改宣德郎		40
政和元年 (1111)	周王宮宗子博士		41
政和二年 (1112)	通判延安府	北宋屬陝西路 (今陝西延安市)	42

首先，從地域上來觀察，呂頤浩供職的地方離不開今天河北、山東、陝西三省，尤其是延安府接近西邊，是防禦西夏的重要軍事據點，在北宋時是具有軍事價

<sup>87</sup> 《忠穆集》，卷六〈與雪峯了書〉，頁十二下至十三上。

<sup>88</sup> 用上注，卷四〈謝封成國公加食邑表〉，頁十九上。

<sup>89</sup> 《呂忠穆公年譜》，頁3575。

<sup>90</sup> 《忠穆集》，卷七〈感舊書懷〉，頁九上。《呂忠穆公年譜》頁3575繫此詩於元符三年(1100)，但詩題為〈呈張智周仲英〉，與《忠穆集》不同。

<sup>91</sup> 表一資料據劉雲軍：《呂頤浩年譜》，頁14–21。

值的府州。頤浩通判延安府，讓他有機會學習如何處理邊事。其次，從人脈上來觀察，大名府國子監教授是得到門下侍郎李清臣（1032–1102）推薦的，說明他甚為欣賞頤浩，這是頤浩受知於新黨人士的經歷。

直至政和二年（1112），呂頤浩已經年近半百，才不過是一位通判，宦途未見突出。在現存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在這段時期有甚麼突出的表現。

### 仕宦西北，嶄露頭角

從政和三年開始，呂頤浩逐步擔任一些較為重要的職務，並有走向技術官僚的趨勢。重和元年（1118），因為「修北京城及被旨行常平賑濟法有功」，頤浩「特轉兩官，除直秘閣」。<sup>92</sup>宣和三年（1121），任職河北轉運司期間，因為「職事修舉，特轉朝奉大夫，除右文殿修撰，賜金帶」。<sup>93</sup>由此可見，相比出仕之初，頤浩開始表現出其治理才能。宣和四年四月，童貫率兵出征燕京，頤浩隨种師中大軍出發，與遼兵相持於白溝，<sup>94</sup>讓頤浩有機會累積軍旅經驗。為了表述方便，筆者根據史料編製成表二，<sup>95</sup>以見從政和三年開始，頤浩仕途上的一些特點。

表二：呂頤浩任官表（1113–1126）

年份	階官 / 職事官	年歲
政和三年（1113）	兩浙路提舉常平等事	43
	提舉蔡河撥發措置糴買	
政和六年（1116）	河北東路提舉常平等事	46
重和元年（1118）	除直秘閣，再任河北東路提舉常平等事 （修北京城及被旨行常平賑濟法）	48
宣和元年（1119）	太府少卿（七寺少卿之末）	49
宣和二年（1120）	河北路轉運判官	50
	直龍圖閣、河北路轉運副使	
宣和三年（1121）	特轉朝奉大夫，除右文殿修撰，賜金帶（以職事修舉）	51
宣和四年（1122）	除徽猷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	52
宣和五年（1123）	落徽猷閣待制，依舊河北路都轉運使兼經制燕山	53
	後復職，進徽猷閣直學士	

<sup>92</sup> 《呂忠穆公年譜》，頁3576。

<sup>93</sup> 《建康志》，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五七上；《呂忠穆公年譜》，頁3576。

<sup>94</sup> 《忠穆集》，卷一〈上邊事備禦十策·料彼己〉，頁五上。

<sup>95</sup> 表二資料據劉雲軍：《呂頤浩年譜》，頁21–39；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1957年），選舉三三之三零，頁4770。

年份	階官 / 職事官	年歲
宣和六年 (1124)	丁太夫人憂，尋起復還任	54
宣和七年 (1125)	在燕山府被郭藥師劫持降金	55
靖康元年 (1126)	被放還返回開封	56
	河北路都轉運使(以病乞宮祠)	
	提舉西京崇福宮	

首先，從地域上來看，除了中央和兩浙外，呂頤浩在這段時期主要在河北供職，令他有機會長期觀察河北一帶的政治、軍事及民風習俗。其次，從專業訓練上來看，這段期間他主要擔任跟財政事務相關的職務，讓他有機會累積豐富的理財經驗，日後成為一位出色的財政官僚。<sup>96</sup>以上兩點對他在高宗初年拜相後處理政務，特別是了解金人情勢、措置戰時財政方面，都有很大幫助。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時期呂頤浩獲得不少磨練的機會：(一)參與燕山之役。宣和四年，宋廷發動燕山之役，頤浩負責軍隊的後勤補給。宋軍戰敗後，他跟隨大軍逃走，卻「在軍前墜馬失道」。他靠著天上北斗往南，「徒步六十里」，又賴當地人張蘭僧引路，才能脫險，抵達涿州。其後他與官員、將校千餘人，「乘雪夜走一百二十里」，至安肅軍，再轉至雄州。<sup>97</sup>(二)措置燕山財政。宋廷收復燕京後，命頤浩措置燕山府財政，特別是負責常勝軍的軍餉。他「在燕山僅兩年，備歷艱險」。常勝軍往往「帶折持刃」，威脅頤浩，索取糧食，讓他「每恐不能逃禍」。<sup>98</sup>(三)成為金人俘虜。宣和七年，郭藥師劫持頤浩等燕山府官員投降金人。宗望押解頤浩等人，進兵至開封城下。頤浩獲釋後，欽宗命他隨種師中往滑州，但他以「陷蕃百餘日，寒月飲冷致疾，力乞宮祠」。

據呂頤浩晚年自述，「臣昨任河北路都轉運使，因金人犯邊，飲食不時，因得嘔吐之疾，自此每歲時或一發」，<sup>99</sup>可見任官河北的經歷，讓他無論在肉體上還是在精神上都吃了不少苦頭。儘管頤浩在西北兩邊開始做出成績，但始終缺乏在中樞供職

<sup>96</sup> 政和三年閏四月，宋廷採納了呂頤浩提出的建議：「除監司、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如監司屬官、鹽場坑冶錢監等窠闕，一切撥還吏部。」同時，「寺監丞、法寺官、外路學官，亦依祖宗及熙豐間故事，令吏部依格法注擬」，藉此壓抑官場奔競之風。見《全宋文》，卷三零四七〈呂頤浩六·內外差遣乞令吏部依格法注擬奏〉，頁316。可見除理財以外，頤浩亦非常留意人事管理的政務，這便可以解釋高宗何以先任頤浩出掌戶部，繼而讓他掌管吏部。

<sup>97</sup> 《建康志》，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五八上至下。《會編》卷一九四(頁二上至二下)所引董華撰呂頤浩行狀並沒有提及這一段經歷。

<sup>98</sup> 《建康志》，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六十下。

<sup>99</sup> 《忠穆集》，卷三〈乞宮觀箚子〉，頁十六下至十七上。



的經歷，正如高宗後來批評頤浩「多歷外官，不詳典故」。<sup>100</sup> 監察御史田如鼇指出，「比來未行一事，中外已傳，皆由省吏不密所致」，高宗就歸咎「呂頤浩不知大體，雖鬻食物之人亦縱之入，故事每漏泄」。<sup>101</sup>

呂頤浩〈上時政書〉云：「去年二月到尚書省，亦常陳述金人八月必侵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sup>102</sup> 如此看來，他早已判斷金人必定再次來犯，所以在乞宮祠獲准後，馬上從開德府前往應天府尋訪家屬，再於靖康元年十一月舉家「寄居揚州，買小園閒居，無仕宦意」，<sup>103</sup> 避過戰禍。從「無仕宦意」一句足見他對仕途不再抱有希望，如果沒有開封淪陷，徽、欽蒙塵，高宗在應天府再造趙宋，揚州很可能成為他度過餘生的地方，而不會有後來出將入相的經歷。

### 兩叨鼎軸，東山再起

建炎元年(1127)六月，高宗詔呂頤浩前往行在，但他「以病辭免」。後來，元祐太后亦召頤浩「至舟中簾前」議事。<sup>104</sup> 可見高宗和元祐太后都很看重頤浩。為了表述方便，筆者根據史料編製成表三，<sup>105</sup> 以見頤浩在高宗初年拜相前擔任的職務。

表三：呂頤浩任官表(1127-1129)

年份	階官 / 差遣	年歲
建炎元年 (1127)	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	57
	試戶部侍郎兼權知揚州	
建炎二年 (1128)	進戶部尚書，依舊知揚州	58
	試吏部尚書	
建炎三年 (1129)	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	59
	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	
	簽書樞密院事兼領江寧府事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	

<sup>100</sup> 《建炎筆錄》，卷上，頁104。

<sup>101</sup> 《要錄》，卷八二，頁1345-46。

<sup>102</sup> 《忠穆集》，卷五〈上時政書〉，頁十三下。

<sup>103</sup> 《建康志》，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六一下。

<sup>104</sup> 同上注，頁六四上。

<sup>105</sup> 表三資料來自劉雲軍：《呂頤浩年譜》，頁42-89。

誠如呂頤浩所言：「臣伏自思念陛下踐阼之初，首降詔命，俾赴行朝，繼擢版曹，寢膺榮遇，出將入相，逮今十年。」<sup>106</sup> 這個階段是頤浩一生中最光輝的時期，當時「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sup>107</sup> 頤浩抵達行在後，高宗即命他掌管戶、吏兩部。在頤浩首次拜相的制文中，高宗就稱讚他「久總邦計，財資騰豐裕之稱；晉長天官，銓選有澄清之譽」。<sup>108</sup> 這一方面反映頤浩在戶、吏兩部成績卓著，另一方面說明高宗對他極為信任與依賴，將兩個最重要的中樞機構交予管理。頤浩後來升為執政，再從執政拜相。<sup>109</sup>

呂頤浩在這段時期的政治表現，可以從兩個層面去觀察。第一個層面是，他沿用自己任官河北的做法，繼續貢獻一己的專業知識。高宗決意南巡，命頤浩修繕揚州城，<sup>110</sup> 他能夠「擾不及民而事辦」。<sup>111</sup> 揚州潰退前，他已建議將左藏庫的官物運送過江，可惜未及執行，他便調任吏部尚書。當金兵撤出揚州後，他馬上渡江至真州，「收榷貨務錢物」，盡量減少財政上的損失，又派陳彥入揚州城視察情況。<sup>112</sup> 他在戶部尚書任內，參與討論朝廷是否復行常平法及實施經制錢。<sup>113</sup> 凡此種種，都可見他仍然發揮著技術官僚那種高效率的辦事能力和豐富的專業知識。

第二個層面是，呂頤浩所表現的不僅僅是在河北任官期間積累的行政才能，而是開始產生政治才能；開始超越著重執行的技術官僚的層次，而達至決策施政的問責官僚的層次。最突出之處，是他分析問題的視野與層次都有所提升，例如他提及官軍的紀律問題：「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尤小，劫掠婦女之禍至深。」建議軍士「自今有犯，必罰無赦」，一方面是要整飭軍紀，但更重要的是，朝廷絕不可以失掉民心。<sup>114</sup> 此外，他提出了整體性的國家政策，開始形成一套治國綱領。他出任戶部侍郎後，「嘗入見」高宗，提出「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等多項建議。<sup>115</sup> 在吏部尚書任內，他又提出備禦十策：「收民心」、「定廟算」、「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並提出「夾淮一戰」的戰略構想。<sup>116</sup> 這些政策可以視為他日後執政時的政治綱領。

<sup>106</sup> 《忠穆集》，卷三〈辭免赴召乞納節致仕劄子〉，頁二八下。

<sup>107</sup> 不著撰人：《皇宋中興兩朝聖政》（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委宛別藏》影宋鈔本，1967年），卷六，頁四上。

<sup>108</sup> 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十四，頁935。

<sup>109</sup> 《要錄》，卷二一，頁413。

<sup>110</sup> 同上注，卷九，頁214。

<sup>111</sup> 《建康志》，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六四下。

<sup>112</sup> 《要錄》，卷二十，頁406、407。

<sup>113</sup> 同上注，卷十八，頁358、372-73。

<sup>114</sup> 同上注，卷十二，頁265。

<sup>115</sup> 同上注，卷十，頁240。

<sup>116</sup> 同上注，卷十八，頁377；卷十九，頁382。

史稱范宗尹「既未嘗歷州縣，不知民間疾苦，又惡聞弊事」，<sup>117</sup>這與呂頤浩在地方上深刻的歷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通過上述三個階段的考察，我們認識到頤浩在政治上是如何成長起來，如何建立政治能力，這些經驗為他以後上台執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 充滿爭議的政治人物

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呂頤浩的文章凡一百三十七篇、詩詞共五十八首，但「較之原目所存，蓋什七而已」。<sup>118</sup>可見頤浩跟其他傳統的士大夫一樣，勤於寫作。就如他自言，「平生喜讀書，一覽輒記，博識警敏」，「長於古文」，「晚年尤好吟詠」。<sup>119</sup>

以上是呂頤浩作為傳統士大夫的面貌，另一方面，他又「喜鞍馬弓劍，慕裴度、李德裕之為人」，欣賞杜牧（803–852）的「知兵，善論事」，認為「自漢至唐士大夫」，只有杜牧深知「虜人未嘗以夏月用兵」。<sup>120</sup>頤浩「平生喜於鞍馬，不畏霜露」，<sup>121</sup>自「壯年性便鞍馬，日馳百里」。<sup>122</sup>於此可以窺見其武夫面貌。用頤浩自己的話說，他是「文慚經緯，止為章句之儒；武昧韜鈴，粗通軍旅之事」。<sup>123</sup>

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理念、觀點、視野、施行的政策，以至在政壇上崛起或衰落的因由，往往受其出身背景及性格偏好所左右。上述這種允文允武的特點，還不足以反映呂頤浩的性格。以下，筆者嘗試勾勒出其性格特點，並說明這些特點如何讓他適應高宗初年的政局。

### 縱覽形勝

從年輕時代開始，呂頤浩便四處遊歷。元豐年間，頤浩年僅十多歲，已跟隨父親「過洛中，嘗瞻見溫公儀範，又嘗至溫公故居，喬木尚存」。<sup>124</sup>靖康年間，頤浩寓居揚州，雖然年近古稀，仍不忘暢遊開元寺。<sup>125</sup>即便是出海避敵的艱難時期，他仍與范

<sup>117</sup> 同上注，卷四二，頁769。

<sup>118</sup> 《忠穆集》，〈提要〉，頁一下。

<sup>119</sup> 不著撰人：《呂忠穆公遺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孔繼涵家鈔本（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卷三，頁四下。

<sup>120</sup> 同上注，頁四上；《忠穆集》，卷一〈上邊事善後十策·論舉兵之時〉，頁五下；《會編》，卷一九四，頁七上。

<sup>121</sup> 《忠穆集》，卷五〈乞依舊宮觀狀〉，頁十二下。

<sup>122</sup> 同上注，卷三〈辭免陝西筓子〉，頁二六下。

<sup>123</sup> 同上注，卷四〈辭免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加食邑表·第二表〉，頁十八下。

<sup>124</sup> 同上注，卷六〈與劉仲高書〉，頁十一上。

<sup>125</sup> 同上注，卷七〈李希中社故門下侍郎郎直次子有文章器業嘗任淮南兩浙轉運使及江淮發運使端康元年三月僕寓維揚游開元寺見公題名感慨成詩〉，頁九下。

宗尹、王絢結伴「游宴金龜峯」，以消鬱結。<sup>126</sup> 他更愛獨自遊歷，「俟八月微涼，即單騎一往，遍到諸山寺」。<sup>127</sup> 頤浩晚年時仍有雅興外遊，云自「閑退以來」，在城東小園園種植小花木，「不輟攜稚子往遊」，又「來春欲游雁蕩」。卜居台州期間，他即便帶病，仍然乘馬出遊，前往蓋竹觀燒香，但「行至中途，不覺墜馬，幾至顛踣」，<sup>128</sup> 足見他愛遊歷四方。〈行次澗池道中〉、〈舟次魏村阻風〉、〈真定城中聞鶯聲方響和賈明仲〉、〈襄邑道中贈孫天子子禮三首〉、〈題汝南縣蒙溪亭二首〉、〈雄州道中寄沈和仲侍郎〉、〈同侯德裕登邠州凌峯閣〉等詩作，都是他在各地所見所聞的記錄。例如〈同侯德裕登邠州凌峯閣〉就是他任邠州教授時，與侯德裕同遊凌峰閣的作品：「招提掛層峰，朱檻倚天半。冷風閣底回，暑晝消清汗。危躋出窈窕，俯視群峰亂。吾人家東州，官學各羈絆。茲游豈易得，勿訝金樽滿。終期汗漫游，醉卧雲巒畔。」<sup>129</sup> 可見頤浩天性好動，沒有一刻能靜下來。

歷史地理學者顧祖禹(1631–1692)認為：「天下之形勢，視乎山川；山川之脈絡，關乎都邑。然不考古今，無以見因革之變；不綜源委，無以識形勢之全。」<sup>130</sup> 呂頤浩早已注意到考察古今地理沿革的重要性。他遊歷的目的，不僅是欣賞名山大川、賦詩以自娛，而是更多地關注地理形勝、山川阻阨、關津河道、民風習俗、物產資源等等。紹興元年(1131)三月，他途經臨安府及嚴、婺、衢、信等州時，就專門視察知嚴州柳約、知衢州李處勵在去年冬天修建的寨柵。據其觀察所得，這些寨柵不僅位置「皆一一可考」，而且「皆依山據險，控扼要衝，使賊馬不奔衝」。<sup>131</sup>

《四庫全書總目》在《忠穆集》的提要指出，「集後三卷，皆《燕魏雜記》」。<sup>132</sup> 蓋呂頤浩在河北時所作，今祇存二十九條，于故事頗有考據。《燕魏雜記》中不乏地理方位、戰場位置、險要地形、戰馬產地、河川改道的記載，具引如下：

- 一、所謂山東者，蓋指太行山言之，今河北路州軍皆山東之地也。
- 二、祁州城堅池深，與安肅、廣信軍犬牙相制，以捍北戎。
- 三、今真定府使廨，雄盛冠於河北一路。府城周圍三十里，居民繁庶。

<sup>126</sup> 《會編》，卷一三六，頁四上。

<sup>127</sup> 《忠穆集》，卷六〈與賀子忱書〉，頁九下。

<sup>128</sup> 同上注，卷三〈辭免陝西筭子〉，頁二六下；卷六〈與黃嗣深書〉，頁四上；〈與康平仲書〉，頁五下。

<sup>129</sup> 同上注，卷七〈同侯德裕登邠州凌峯閣〉，頁六上。

<sup>130</sup>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今(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凡例〉，頁1。

<sup>131</sup> 《全宋文》，卷三零四八〈呂頤浩七·乞賞柳約李處勵奏〉，頁326。

<sup>132</sup> 陸游(1125–1210)稱《燕魏雜記》為《燕魏錄》，見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菴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十，頁133。

- 四、僕嘗過井陘縣，今天威軍是也。李左車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真控扼之地。<sup>133</sup>
- 五、北京真定府西至獲鹿縣七十里，又九十里至井陘縣，縣東近十里井陘口，有淮陰侯廟。韓信常置背水陣於井陘口。
- 六、古云：「馬出冀北。」故韓退之〈送溫造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馬羣遂空。」今河北冀州不產良馬，此所講冀北者，疑今秦州是也。
- 七、後唐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至晉。
- 八、衛州共城縣北門外三里，群山聳秀，壁立千仞，山下眾泉湧出於地，泉底皆碎石，清徹可鑒，鬚髮浸灌十餘里，匯為御河。元祐年間，黃河行河東北路，自大名府東流入永靜軍，由滄州至獨流寨入海，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由思州接塘泊以通漕運。紹聖以來，大河行河北西路，御河水灌大河，漕運遂不通。<sup>134</sup>

事實證明，頤浩確能將多年來積累起來的地理知識，應用在實際方面。

建炎元年九月，呂頤浩提出，「滄州并濱州一帶與北界地形鄰接，最係要害去處，理宜措置」。<sup>135</sup> 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他說「嘗於雄州、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sup>136</sup> 紹興七年(1137)正月，他指自己「自少壯時遍走兩浙、京東、河北及敵中沿海地分」，所以「通知海道可往去處」，建議「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偽齊京東諸郡、河北諸郡及敵中諸郡」；又「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州明船又次之」，這是因為「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sup>137</sup> 以上數例，說明頤浩閱歷豐富。

杜牧認為，「若得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sup>138</sup> 這些通過縱覽各地形勝得來的知識與經驗，為呂頤浩在制定各項政策時，提供了很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這種經歷豐富了他的人生閱歷，讓他比其他的戰時宰相，具有更開闊的視野。

<sup>133</sup> 《讀史方輿紀要·總敘三》已注意到「先知井陘之陘，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頁17)。

<sup>134</sup> 以上引文見《忠穆集》，卷八《燕魏雜記》，頁四下至五上、十下、六上、二上至二下、一下至二上、三下、九下、十上至十下。

<sup>135</sup> 《全宋文》，卷三零四七《呂頤浩六·滄濱合用劔魚戰船奏》，頁314。

<sup>136</sup> 《忠穆集》，卷一《上邊事備禦十策·備水戰》，頁十三上。

<sup>137</sup> 同上注，卷二《論舟楫之利》，頁十三下、十四上。

<sup>138</sup> 曹操等(注)、郭化若(譯)：《十一家注孫子》(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卷下《地形篇》，頁175。

## 嗜酒好色

呂頤浩在晚年給李邴的信中，自言：「居閑以來，頗得杜門修心養性之法，此外，無可言者。」<sup>139</sup>然而，他是否真的「修心養性」？《秀水閒居錄》卻有另一種描述：

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柁，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柁死，諸大將以厚賂取之，呂力爭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頤浩為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頤浩六十七歲矣。<sup>140</sup>

頤浩六十七歲當年，是為紹興八年（1138）。

首先，頤浩是否喜杯中物？他的詩作常常出現「酒」、「醉」，以及與酒器、釀酒等相關的用詞，例如「勿訝金樽滿」、「醉卧雲巒畔」、「勿使酒樽空」、「醉吟爛賞湖山色」、「尋蹤曾醉姑蘇酒」、「籬菊半開家釀熟」、「寄與鄉朋供一醉」、「捧觴應笑獨醒人」、「它時釀入椒漿後」、「籬菊正開家釀熟」、「醉伴釣魚翁」、「飛觴同醉待來年」、「開罇細酌山中酒」、「一樽清酒散牢愁」、「載酒相邀入醉鄉」等詩句。<sup>141</sup>由此可以判斷他喜歡喝酒。

呂頤浩不只飲酒，還親自釀酒，甚至將釀酒心得撰寫成書。據他晚年透露，儘管自己已是「衰老之年，早晚服藥各一杯」，但仍然「每月釀四五兩，雖氣味農香不逮兵廚，自有野醪真趣」。<sup>142</sup>靖康年間，他「寄居南京及維揚，自釀玉友，親知以為妙

<sup>139</sup> 《忠穆集》，卷六〈與李漢老書〉，頁二下。

<sup>140</sup> 《中興小紀》，卷十八，頁225。據《要錄》（卷二八，頁566）云，韓柁乃韓粹彥之子、韓琦（1008–1075）之孫，宣和（1119–1125）末任戶部侍郎，後責黃州安置。建炎初年，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駐軍江州，常與韓柁「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以為來犯金兵只是小盜，派前軍統制王德前去剿辦，「始知金人至，遂遁」。按《中興小紀》指此事出自朱勝非的《秀水閒居錄》，但丁傳靖（1870–1930）《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十四則指此事出自《樵書》（頁770）。《秀水閒居錄》一書「於南渡諸公行事，貶駁殆無全人」，以致周輝以為「其公論耶，私意耶？」（《清波雜誌校注》，卷五〈秀水閒居錄〉，頁199）近人發現，談遷（1594–1657）《棗林詩文集》卷五〈讀朱文公集〉記載上述故事，云出自朱熹口述。詳參諸偉奇：〈從談遷的一篇文章談起〉，《安徽史學》2008年第4期，頁120–21。

<sup>141</sup> 以上引詩見《忠穆集》，卷七〈同侯德裕登邳州凌峯閣〉，頁六上；〈龍興寺閣〉，頁六上；〈次韻劉省元希範題孫伯溫舫齋〉，頁七上；〈送朱景行〉，頁十下；〈偶成〉，頁十三上；〈新酒金橘寄李德升〉，頁十四下；〈桂齋二首〉，頁十六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一三四七〈登巾子山寄懷韓嗣夫〉，頁15392；〈次韻郭傳師寵寄閑居之什〉，頁15393；〈次石迪功韻〉，頁15393；〈次鄭顧道韻〉，頁15395；《忠穆集》，卷七〈雜京師〉，頁十上；《全宋詩》，卷一三四七〈次洪成季韻〉，頁15394。

<sup>142</sup> 《忠穆集》，卷六〈與程晉道書〉，頁八上。

嘗」，著有《玉友補遺》一卷。<sup>143</sup>在給劉仲忱的信中，他提及自己南渡後，「雖然精意釀造，輒爾不成」，卻「蒙惠雙樽」，酒味「清冽可愛」。<sup>144</sup>可見其酒癮之大。後人收集得頤浩一篇訓示姪兒呂擢的帖子，其中一條有云：「勿飲酒。」<sup>145</sup>這與頤浩酷嗜杯中物的性子又有矛盾。

呂頤浩、張浚興師勤王、討伐苗、劉時，「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犒勞偏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款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後來，呂、張二人出任宰執，仍舊「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箕踞，以至嘲戲謔，喧闐紛拏，無復禮儀，至呼諸將第行，以兄事之云幾哥」，以致「階級之法廢矣」，「逸者深惡之」。<sup>146</sup>無怪朱勝非認為，「若以二人作相，諸將必喜」。<sup>147</sup>可見頤浩憑藉杯中物與武夫維繫情誼，彼此呼兄喚弟，令他們為朝廷效力，不生異心。

其次，呂頤浩是否好女色？紹興三年（1133）五月，左文林郎王闡被除名。普通官員被除名其實並非大事，但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記載，當時一位叫楊世輔的武將，求售自己一位美妾，頤浩欲得之，卻被王闡捷足先登，頤浩大怒，指使宣諭官朱蒙「劾其不法」，再「奏遣大理寺丞姚焯往平江案治」，最終王闡「坐詭立官戶，減免助軍錢，特責之。其所欠租稅，悉令以其家田土計置納入官」。<sup>148</sup>上述記載無疑增加了《秀水閒居錄》指頤浩好色的可信性。

據陸游云，紹興（1131–1162）中葉，李光（1078–1159）給其父陸佃（1042–1102）寄了一封信，內容提及「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某人」是誰？陸游沒有明言，只說他是「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丁傳靖在這則資料下加按語云：「按此當即指呂頤浩。」<sup>149</sup>如此「某人」很有可能是指呂頤浩。這則資料進一步證明頤浩偏好女色，然而從「汲汲求少艾」一語來看，筆者懷疑頤浩偏好女色，並非純粹為了滿足性慾，或許跟他深信道家以房中術延壽有一定關係。

如果從傳統道德層面詮釋上述幾則資料，即便到了晚年，呂頤浩仍然寵幸家妾，他無疑是好色之徒。然而筆者認為，我們不妨從政治層面解讀他這種偏好：高宗初年，外憂內患，局勢動盪，像頤浩這類政治人物，才具有充足的精力面對時勢的嬗變，肆應動盪的政局。

<sup>143</sup> 同上注，〈與賀子忱書〉，頁九下。

<sup>144</sup> 同上注，頁九上。

<sup>145</sup>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臺北：興中書局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1964年），頁十一下。

<sup>146</sup> 《要錄》，卷六十，頁1029。

<sup>147</sup> 同上注，卷二二，頁469。

<sup>148</sup> 同上注，卷六五，頁1099。

<sup>149</sup> 《老學菴筆記》，卷八，頁103；《宋人軼事彙編》，卷十四，頁770。《雞肋編》卷下云：「有太府寺丞華某，上留守呂丞相書，於紙尾圖男女之狀。」（頁110）這是諷刺呂頤浩好女色，還是阿其所好？

## 出入敵陣

《宋宰輔編年錄》載孝宗曾問龔茂良曰：「趙鼎比呂頤浩何如？」龔茂良回答道：「呂頤浩有膽略，緩急之際，能任大事；趙鼎有學問氣節，皆名相也。上曰：『太上南渡之初，再造國事，正賴諸人。』」<sup>150</sup> 史載頤浩「每用兵，必親冒矢石，臨陣督戰，自大將韓世忠以下，咸畏服云」。<sup>151</sup> 明人錢士升評論他「粗有武才，亦饒胆畧」，<sup>152</sup> 這種膽略大概是他從騎射、舞刀、弄槍中培養出來的。頤浩在招降巨盜、揚州潰退、苗劉兵變、航海避敵這幾件事中，表現特出，可窺見其過人的膽色。

呂頤浩「凡招大寇，必單騎素隊入賊軍，雖十數萬眾，莫不聽命解甲」。<sup>153</sup> 劇盜張遇有賊眾四五萬人，攻破太平州、真州，肆虐兩浙一帶；其後接受王淵招安，但仍「縱兵四劫」。高宗遣頤浩節制劉光世等武將剿賊，頤浩帶領長子呂抗及二三屬官駐紮揚子橋，後與韓世忠（1089–1151）「聯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磔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餘黨佈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sup>154</sup>

揚州潰退後，高宗問眾臣該如何善後？呂頤浩「以首叩地」，表示「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sup>155</sup> 他即「引羸兵千餘人守揚子江」，再收集潰兵四五百人，「就鎮江府之北，枕江下砦，與金人對岸相持」。他更「被甲乘輕舟，時於江中往來」，巡視軍情。<sup>156</sup>

苗劉兵變發生後，呂頤浩「即走入杭伺賊」，刺探叛軍情勢，<sup>157</sup> 然後聯絡張浚、劉光世等起兵勤王。頤浩「躬擐甲冑，據鞍執鞭誓眾，士皆感勵」。<sup>158</sup> 勤王軍開抵秀州後，頤浩「以單騎入朝」，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苗傅等「益懼」。<sup>159</sup> 後來，勤王軍與叛軍戰於臨平，頤浩「在中軍，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sup>160</sup>

<sup>150</sup>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六，頁1118。

<sup>151</sup> 《呂忠穆公遺事》，卷三，頁四上。

<sup>152</sup> 錢士升：《南宋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年（1797）掃葉山房刻本，卷十〈呂頤浩〉，頁十下。

<sup>153</sup> 《呂忠穆公遺事》，卷三，頁四上。

<sup>154</sup> 《要錄》，卷十二，頁277；《建康志》，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六六上。《建康志》並無提及韓世忠，只云「公單騎入賊砦中」。

<sup>155</sup> 《要錄》，卷二十，頁392。

<sup>156</sup> 《建康志》，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六七上至六七下。

<sup>157</sup> 《要錄》，卷二一，頁424。

<sup>158</sup> 同上注，頁438。

<sup>159</sup> 同上注，頁459。

<sup>160</sup> 同上注，卷二二，頁466。



高宗定策航海避敵後，群情洶湧，衛士百餘人趁呂頤浩入朝時，「遮道問以欲乘舟何往」。因為「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為國家死戰者？」結果，「眾欲殺頤浩」，幸得范宗尹解圍，「引其裾入殿門」，並立即關上殿門。<sup>161</sup>後來，車駕出發前往明州，但舟船「不能過堰，上命衛士曳之」，引起班直數十人不滿，高宗乃命頤浩「冒雨着泥靴彈壓之」。頤浩向眾班直言：「今虜人侵陵，國家兵勢不敵，自當避之，豈可不念國家之急而欲沮眾。」結果，「班直理屈，往往跳水而死」。<sup>162</sup>

呂頤浩即使拜相，仍無改這種性格。高宗駐蹕平江府，巨師古麾下裨將葉隆「作過於虎邱山」，頤浩怕驚動高宗，「遂親擐甲冑，整備御營使司人馬，欲去擒賊」。<sup>163</sup>後來，頤浩又請纓留守平江府以督諸將拒金兵，但高宗以為「頤浩不可去」，才改任周望為兩浙宣撫使，留守平江府。<sup>164</sup>高宗曾稱許頤浩「躬臨行陣，親冒矢石」。<sup>165</sup>在當時國步維艱的時局中，這類膽色過人的政治人物，將較易取得出頭的機會，因為他們能夠承擔重任，處理大政。

### 整飭堂吏

史載呂頤浩「性嚴重剛果，無所屈撓，凡人陳述利害，有不中理者，輒面折之，然必用其所長」，因而「所至政事嚴肅，官吏不敢犯法」。<sup>166</sup>他對待堂吏的態度，從中可以窺見其剛烈的性格，也令上述記載益發可信。

中書省設有堂吏的辦事吏員，太祖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為奸賊」，「改令吏部於士人中選授」。<sup>167</sup>由此可見，堂吏事權之重及其衍生的流弊。呂頤浩曾聲稱，「緣官不知法，故吏得以欺也」。早在任職吏部期間，他已經「頗見其弊」，<sup>168</sup>深知對待吏員不可過於寬厚，所以上台執政後，「治堂吏絕嚴」。<sup>169</sup>

據《獨醒雜誌》記載，呂頤浩首次拜相後，「嘗在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幘」。這位堂吏氣憤難平，對頤浩說：「祖宗以來，宰相無去堂吏巾幘法。」頤浩反駁說：「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結果，「吏不能對」。<sup>170</sup>又據《老學菴筆記》記載，某位堂吏

<sup>161</sup> 同上注，卷三十，頁584-85。

<sup>162</sup> 《會編》，卷一三四，頁一上至一下。

<sup>163</sup> 《忠穆集》，卷三〈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日乞宮觀筭〉，頁五下。

<sup>164</sup> 《要錄》，卷二八，頁554。

<sup>165</sup> 《忠穆集》，卷三〈辭免知潭州第三筭子〉，頁十四下。

<sup>166</sup> 《呂忠穆公遺事》，卷三，頁四下。

<sup>167</sup> 王楙（撰）、誠剛（點校）：《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一，頁4。

<sup>168</sup> 《中興小紀》，卷十三，頁167、169。

<sup>169</sup> 《老學菴筆記》，卷二，頁22。

<sup>170</sup> 《獨醒雜誌》，卷九，頁80。

因忤逆頤浩之意，被他用手擊打面部。這位堂吏已有一定的資歷和地位，故「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頤浩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屨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在。』」一眾堂吏「相顧稱善而退」。<sup>171</sup> 以上兩則記載，反映出頤浩整治堂吏之嚴，甚至動手打人，令其剛烈的性格躍然紙上。

呂頤浩其後出知臨安府，掌理首善之區，「決事明敏，而又威令嚴重。豪右震懼，日纔過午，訟庭已寂然無事」，例如「醫僧有謀殺婦人者之類」，頤浩「灼見其冤狀，置之於法，輦轂之下，政若神明，宮禁內外，咸賴以安」。<sup>172</sup> 可見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頤浩都保持一貫的威嚴。

要應付這群熟知行政運作、律令法規的吏員，以及在地方上力量強大的豪強，辦事官員必須具備剛烈、不畏事的性格，因為性格稍為軟弱，就很容易受制受辱於這群胥吏豪強。

### 適應時勢

呂頤浩雖然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循一般讀書人的老路，以科舉晉身仕途，藉此揚名聲、顯父母，然而他做事沒有拘泥於成規、一成不變的習慣，反而能夠按照實際環境而作出調整。

前述呂頤浩擔任燕山府轉運使時，剛巧遇上金兵進攻燕山府，他曾提議宣撫使蔡靖放棄燕山府而遁，以免束手就擒，可惜這個意見被視為畏敵，不為採納；但從頤浩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亦可觀察到他那種絕不迂腐、講究現實的性格特點。

建炎初年，呂頤浩與高宗討論人材之難得。頤浩以為：「承平之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財，可濟今日。」高宗慨歎說：「前此太平，若朝士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為失體；纔置良弓利劍，議者將以為謀叛。」<sup>173</sup> 揚州潰敗後，高宗「儀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sup>174</sup>

建炎三年六月，高宗「欲親閱武」，頤浩隨即表示贊同，認為「方右武之時，理當若此」，並以為「祖宗時不忘武備」。<sup>175</sup> 高宗欲登岸乘馬，與文武臣僚共歷艱辛，又遭到大臣反對，認為這樣有失體統。頤浩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勘定之時，馬上治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

<sup>171</sup> 《老學菴筆記》，卷二，頁22。

<sup>172</sup> 《建康志》，卷四八〈古今人傳二·忠勳傳〉，頁八二下至八三上。

<sup>173</sup> 《要錄》，卷三二，頁627。

<sup>174</sup> 同上注，卷二十，頁393-94。

<sup>175</sup> 《宋會要輯稿》，禮九之一零，頁533。

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sup>176</sup>他批評儒士書生拘泥於成規，不知變通，勸諫高宗「以神武為事，勿拘俗儒之論」，即使「議者或以臣為非，臣亦不恤也」。<sup>177</sup>

紹興二年(1132)十二月，禮部尚書洪擬提出依元祐之法，科舉取士兼用詞賦、經義，曾統以為「可止用詞賦」，高宗以為「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頤浩卻認為兩者皆「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sup>178</sup>儘管他循科舉進身仕途，卻觀察到科舉在選拔人材方面的問題。

### 獨斷專行

苗劉兵變平定後，呂頤浩「自以謂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秉鈞既久，又侍上汎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威福」，<sup>179</sup>反映出頤浩行事專斷，他亦坦承「性資剛僻」，<sup>180</sup>只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情，則不會理會他人的反對意見。頤浩曾致書張浚，批評當下「台諫尚循舊態，論事不切時務」，但張浚以為「台諫箴規人主闕失，糾彈朝廷官邪，當優容之」，<sup>181</sup>可見頤浩缺乏容人之量。

呂頤浩首次執政不久，高宗派遣洪皓(1088–1155)等使金。出發前，頤浩接見洪皓，史稱頤浩「大悅」，並「脫巾衣服之」。後來，高宗命洪皓與宰執議定國書，洪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滿，「遂罷遷官之命」。<sup>182</sup>後來，洪皓奉使至淮南，上疏高宗請朝廷撫諭李成。高宗遂遣使撫諭李成，給米五萬斛。頤浩「怒皓不先白堂，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sup>183</sup>又胡寅(1098–1156)上〈萬言書〉，「論天下事切中時病」，但頤浩「不喜而罷之」，以致「天下之士皆箝口矣」。<sup>184</sup>凡此足見頤浩處事霸道，不大接受他人意見。

高宗初年，正是時局艱難之際，呂頤浩執政獨斷獨行，不難理解，但因此惹來不少同僚的非議甚至攻擊，也是情理之內。儘管頤浩曾公開表示，「祖宗時遇大事，

<sup>176</sup> 《忠穆集》，卷五〈論車駕乘馬事狀〉，頁八下至九上。

<sup>177</sup> 同上注，頁八下至九上；《全宋文》，卷三零四六〈呂頤浩五·論車駕乘馬事狀〉，頁306。

<sup>178</sup> 《要錄》，卷六一，頁1047。

<sup>179</sup> 《揮塵錄》，後錄卷一，頁67；第三錄卷三，頁253。雖然如此，但有論者以為呂頤浩「雖豪曠然辦事之臣」，「雖云顛恣，而幹濟練達，一時倚重」。見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五下〈補遺〉，頁八上、九上。

<sup>180</sup> 《忠穆集》，卷四〈辭免少保左僕射表〉，頁六上。

<sup>181</sup> 《要錄》，卷四十，頁743。

<sup>182</sup> 同上注，卷二三，頁484。

<sup>183</sup> 同上注，卷二四，頁492。

<sup>184</sup> 《會編》，卷一三二，頁三上。

亦召公卿集議」，<sup>185</sup>但從他同僚的批評意見來看，他並無這樣做。御史中丞辛炳指出：「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即便駐蹕會稽期間，「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但「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顧同列間情猶不通，況君臣之際乎？」<sup>186</sup>

呂頤浩不但自己如此，還鼓勵高宗處事專斷：「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他又舉出兩個皇帝獨斷而成事的例子：（一）「晉武帝欲伐吳，群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二）「唐憲宗欲伐蔡，眾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一舉而擒吳元濟」。<sup>187</sup>可見頤浩自比張華、裴度，認為建炎之初「金人分三路追襲車駕，是時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英明獨斷，必為海道之行，至於今日，怙然無虞」。<sup>188</sup>然而，頤浩首次罷相，其罪狀之一，正是「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眾議」。<sup>189</sup>

呂頤浩上述的性格特點的確有助於穩定政權，但亦因為這種性格，令其處事專擅，未能廣納意見，很容易令政策產生偏差甚至造成失誤。在同樣的環境下，人的個性不同，決定了人的命運不同。頤浩是一位好動的、外向的政治人物，文武兼濟外，更具有與眾不同的性格與偏好。這些特點，一方面令他能夠適應高宗初年那種內外交困的政治環境，成為解決各項國家問題的功臣，從而造就了他出將入相的機遇；另一方面，亦為他樹立了不少政敵，在政治上遭受攻擊。

## 結 論

根據以上各部分的討論，可做以下總結。

第一，自神宗朝以來，宋、遼、夏的形勢產生了劇變，導致宋廷內部形勢產生變化：金人攻破北宋首都開封，結束了宋廷統治。雖然趙構繼承了大統，但形勢異常嚴峻。一方面金人不斷追擊，導致揚州大潰退，令原本嚴峻的形勢雪上加霜；另一方面，高宗的皇位本來就是充滿爭議性，結果引來苗、劉發動兵變，逼迫高宗退位。雖然兵變最終在呂頤浩、張浚等發動勤王下被救平，頤浩更因起兵救援王朝有功，接替下台的朱勝非拜相。然而，他上台執政後，面對的卻是瘡痍滿目、百廢待興的局面。

<sup>185</sup> 《中興小紀》，卷七，頁79。

<sup>186</sup> 《要錄》，卷七六，頁1247-48。

<sup>187</sup> 《忠穆集》，卷二〈論并謀獨斷事〉，頁十五下。

<sup>188</sup> 《全宋文》，卷三零四七〈呂頤浩六·論察言奏〉，頁312。

<sup>189</sup>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四，頁947。

第二，呂頤浩出身自一個山東寒族，其父儘管參加了科舉，得以涉足官場，但仕途不濟，至於其祖父、曾祖父更是沒有仕宦的經歷。雖然山東呂氏並非顯赫大族，但從記載來看，他們頗具文化素養，能夠給予頤浩繼承家學的機會。除家學外，頤浩亦曾入讀濟南府官學。受到家學與官學的雙重培育，頤浩考取進士及第，得以晉身官場，開展了漫長的仕宦生涯。

第三，呂頤浩拜相前的仕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出仕之初，他主要在河北、陝西一帶任官，但職位並不高；到了第二個階段，他主要集中在河北任官，而且職位多與財政事務相關，造就他成為一位技術官僚，但他仍很少入朝為官的機會；在第三個階段，他得到高宗賞識，從戶部侍郎開始，進而戶部尚書、吏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最終拜相。同時，我們通過他三個仕宦階段，觀察到他如何從處理實務的技術官僚，逐步成為能夠提出整體政治理念的士大夫，為他日後拜相執政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第四，除了喜歡賦詩、騎射外，呂頤浩表現出多樣的性格，包括愛四處遊歷、喜酒好色、膽色過人、剛直貞烈、獨斷專行。這些特點都有利他處理高宗初年紛亂的局面，但其剛愎自用、獨斷獨行、缺乏包容的性子，亦為他樹立了不少政敵。

從呂頤浩這個戰時宰相的個案，我們能夠觀察到，當國家處於戰爭狀態之時，執掌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人物所必須具備的經歷及性格特點。

# Lü Yihao's Character and His Early Experienc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bstract)

Leung Wai Kei

In 1125, the Jurchens tore up the military covenant with the Northern Song, and launched southward. After the fall of the capital Kaifeng, Huizong, Qinzong,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clan and common people were captured by the Jurchens. Emperor Gaozong inherited the throne and create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continuity of the new regime, he and his prime minister had to face many political issues. Lü Yihao (1071–1139) was the key prime minister of Gaozong to overcome the crisis and safeguard the regime. In this paper,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four issues: (1) describes the expansionist policy from the mid-Northern Song; (2) retrospectively examines Lü Yihao's family background, as well as his participation in civil examinations; (3) tracks the first three major stages leading to the officialdom of Lü Yihao; (4)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of Lü Yihao. By the above discussion, this paper tries to sum up the requisite conditions for a wartime prime minister to have.

**關鍵詞：** 呂頤浩 山東寒士 中興名宰 戰時宰相

**Keywords:** Lü Yihao poor scholar from Shandong prime minister remembered for resurrecting the country wartime prime minister